

跨越中等收入陷阱，关键在于 制度安排和环境营造

辜胜阻

(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、民建中央副主席)

中国，那么八成搞房地产去了。几年前我去中关村调研，中关村有一位非常资深的民营高科技企业的老板跟我讲，这一辈子他最后悔的事情就是没做房地产，搞高科技企业非常辛苦，而且不赚钱。我们也看到相当大比例的民营企业都在做房地产。还有人说，乔布斯如果在中国，可能连工作都找不到，因为他没有本科文凭。这就给我们一个启示：现在我们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，要把蛋糕做大，但原有的通道和路径是不可能把蛋糕做大的，必须依靠创新。创新的关键是要有乔布斯这样的人物。因为，乔布斯被称为商业奇才、创新骄子，同时也是艺术天才，他改变了音乐、通信的消费模式，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。他富可敌国，有全球市值最大的企业。怎么样才会有乔布斯呢？我认为要改良“土壤”。我们要有创新的文化，要营造环境，最后要创新制度。

前几年讲中等收入陷阱，有专家就说，中等收入陷阱是什么意思呢？哪一种类型的国家没有中等收入陷阱呢？给我们的一个启示是，贫困的国家、低收入的国家有贫困的收入陷阱，高收入的国家有高福利的陷阱，欧债危机、美债危机都是高福利造成的。有人说，中国是救欧洲还是救温州呢？救欧洲，欧洲怎么救呢？所有的政客上台首先要么加福利，要么减税。无论是加福利还是减税，首先得改变政治制度，这是很重要的。中等收入陷阱是因为发展没有动力、经济减速以及贫富鸿沟加深所造成的现象。

2010年世界银行行长佐立克来到中国，说中国面临最大的问题是中等收入陷阱。亚洲开发银行行长到中国来，也讲中国最大的挑战是怎么摆脱中等收入陷阱。林毅夫先生也认为，要避免中等收入陷阱，应从三个方面入手：一是要推动产业升级；二是做好分配；三是处理好资源与环境的关系。北京大学副校长刘伟也认为，导致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是创新不足。清华大学教授胡鞍钢认为，中等收入陷阱是因为比较优势下降了，社会原因是贫富差距，政治原因是改革不能深化。郑秉文还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十大表现。我认为，最重要的是福利陷阱和城市化陷阱。所有人都城市化了，没有工业化支撑，很多人生活在贫民窟里，警察都不敢进入贫民窟。中国的人口陷阱表现为老龄化和未富先老。当前普遍化的民工荒问题，其最大的问题就是新生代的农民工问题。老一代农民工给钱就加班，而新生代农民工要享受生活，他们和老一代农民工不一样，从而造成民工荒的问题。

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三个现象是腐败、既得利益集团阻碍改革和分配。怎样才能摆脱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呢？温州的问题表面上是高利贷现象，是转型的阵痛，那么多的老板为了转型，结果陷入了盲目多元化的陷阱，受到人力资源的限制，产业层次很低。理想和现实落差很大，“十二五”规划最精彩的部分是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，想法很好，但现实落差很大。2011年上半年的居民收入增长7%，而政府的财政收入增长31%。现在我们GDP总量已经超过日本，但是平均数只有日本的1/10。再说，平均数也不能反映什么问题，人均GDP为4000美元，也不能反映真实水平。网上有一个段子叫《平均数背后怎么看》，老张是一千万，九个邻居穷光蛋，平均起来算一算，个个都是张百万。人均4000美元背后有大量的贫富差距，接近0.5的警戒线，传统的方式肯定难以继续，通道走不下去。传统的方式是低成本、低技术价格、低利润、低端市场，代价是高能耗、高污染等。强大的制造，低端的设计，虚弱的品牌，巨大的排放，微薄的利润，富士康生产Ipad平均利润只有

今天，我要演讲的题目是《跨越中等收入陷阱，关键在于制度安排和环境营造》。为什么要讲这样一个题目呢？因为昨天我刚从宁波回来，宁波现在准备用5000万元培养1400名乔布斯式的领军人物。所以，这一下子又引起了网民轰动。有人问，中国有没有乔布斯产生的土壤？有人说，如果乔布斯在

2%，售价 500 美元，得到 11 美元，所以，有那么多的人跳楼。中国的劳动生产率是美国的 1/12，是日本的 1/11，创新对经济的贡献只有 40%，发达国家达到 70%。创新很重要，有人讲中国现在中等收入陷阱有三个方面的原因，即创新不足、成本上升、需求疲软，但创新是最重要的因素。

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呢？中国要出乔布斯，最重要的是创造环境。十六大报告中有一句非常精彩的话，但是，现在看起来与现实相差太远。所以，要放手让一切劳动、知识、技术、管理、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，让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。现在我们做得还很不够，还没有这样的环境，乔布斯成长的“土壤”是不存在的。

在制度和技术的的问题上，中国不缺创新的要素，技术、人才、资金都是不缺的。但是，我们缺少的是如何把要素集成起来，进行制度创新。在文化和企业的问题上，应该说，文化是一个社会创新的基因，我们不缺少科技型企业，但是，我们需要与创新相匹配的科技文化、人文文化和创业文化。美国硅谷的创业文化的最基本精神是宽容失败，鼓励冒险。但是，我们的文化是以成败论英雄。所以，这种文化的冲突很难让创新人才获得这样冒险的机遇。

创新应该是国家意志，有人说转变发展方式已经讲了几十年，但是很难创新。创新的问题几十年前就认识到了，然而，现在的现实与国家的意志还是不一样。目前，最需要把国家的意志转变为企业的行为。我对大量的科技企业进行调研，发现科技型企业之所以不创新，主要有四个原因：一是动力不足，不想创新。二是风险太大，不敢创新。创新是九死一生的冒险过程，风险非常大。三是能力有限，不会创新。四是融资太难，不能创新。所以，要把国家意志变为企业的行为，政府应该解决这四个方面的问题。从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的迈进，我们靠的是人口红利。有人说改革开放 30 年，第一个十年靠人口红利；第二个十年靠国有企业改革，即靠改革红利；第三个十年靠对外开放，即加入 WTO 十年靠开放的红利，主要的因素还是人口红利。下一步要向高收入国家迈进，必须靠制度红利。在第一次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转型的过程中，我调查了几百家企业，有 9 种因素叠加，企业的成本很高，十年前加入 WTO 靠廉价劳动力，十年后我们发现中国不再便宜了。在这种环境下，我们必须走创新之路。

温州表面上看起来是高利贷化，民间资本热钱化。大量的民间资本存在，大家都想赚快钱，房价高企。温州有两个“癌症”：高利贷和高房价。“温州现象”背后是实体经济的“空心化”。奥巴马请了一批专家分析美国为什么爆发金融危机，结论是美国实体经济“空心化”了，制造业“空心化”了。我们也要防止制造业的“空心化”，温州就折射出实体经济的“空心化”现象。中小企业老板跑路，大老板移民。据估计，27%的企业老板移民，47%考虑移民，即 74%的企业老板正在考虑移民和正在准备移民。所以，我觉得要从三个方面解决这个问题：一是必须依靠改革，破除改革碎片化，防止头痛医头、脚痛医脚，不能局限于救火性质的短期改革。二是破除改革应急化，不能停留在部门层的小修小补。否则，老问题久改不改，新问题层出不穷。三是设计改革和推进改革的局面要改变。我们不能让地主老财设计土改，地主老财设计土改，土改没办法进行，应防止部门利益对改革的束缚。今后，最重要的改革是以下三项改革：一是垄断行业的改革。这需要拓宽投资渠道和融资渠道。现在不仅是融资渠道的问题，大量的民间资本彷徨纠结，有钱没地方去投资。二是财税和分配机制的改革。三是进行金融体制的改革。只有三项改革实现了制度统一，才能使中国从中等收入国家成功迈向高收入国家。

责任编辑：周全林